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新／〇號

祇供參考  
請勿發表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五日

蘇聯在巴爾幹的基地

保加利亞

JAN 19 1948

本文譯自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六晚郵  
週報，作者為狄馬雷·貝斯氏 (Dunmore  
Bass)

訪問保加利亞在今日的歐洲是最困難的了。你若想踏進這塊土地，先須花上幾星期甚至幾个月的功夫。該法獲得那必要的許可，等到許可獲得後，你仍須另外設法獲得一路經過的各國的通行證。我在巴黎曾設法乘飛機去，然而竟沒有一家旅行社能替我想出一個飛往該國的辦法來。這簡直像是要「飛到大星去的飛機票」一樣困難。

雖說要受着一切的麻煩並須抱着極大的耐心，但到這個國家去訪問是值得的。巴爾幹是蘇聯企圖單獨管制的區域，也是美國竭力想阻遏蘇聯擴張的地方。它因此乃是歐洲最富爆發性的地區——而保加利亞則是它真正的中心。

當我到達保加利亞的那天，我拜謁了保國的內閣總理喬治·坎米特普夫 (Georgi Dimitroff)。他請我隨意到他國中任何地方去遊歷或參觀。這位曾任莫斯科共產國際首領多年，已屆六十有五高齡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員，所以完全放心地向我作這樣的邀請，因為他和他的蘇聯朋友們正要美國人知道他們在這裏的設施是怎樣地堅

強。標榜保加利亞為蘇聯在巴爾幹的主要軍事基地是對他們有利的。

蘇聯政府已昭示全世界，它相信現時保加利亞基地的一切情形，都是在良好的工作秩序中。這項告示可從蘇聯去年八月間突然批准保加利亞和約的文義中看出。這德約早就由英美兩國批准，蘇聯有意地稽延，直等到他們對於這裏已建起的親蘇政府完全滿意時，纔予以批准。

保加利亞是一個理想的蘇聯軍事基地，因為這個國家銜接着希臘與土耳其，而希土兩國目前正受着美國的支持。地理的形勢造成了保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使這小國在它全部動亂的歷史中始終遭受着磨難。這些堅苦與單純的人民，很少時候能過着富裕生活，因為他們所擁有的領土對於好侵略的隣國，是大有利用的。這個國家曾反復地被外國軍隊所侵略——匈牙利、土耳其、奧地利、俄羅斯、日耳曼，而現在它又牽入美蘇鬥爭中了。

就保加利亞而言，這種不快的局勢或許是經常的情形，但對於美國人，它確是一格新的煩惱。美國自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直接捲入巴爾幹戲劇性政治漩渦中，而這更是美國代表們的一種苦痛的经验。因為事實很明顯，我們在這次賭賽中並未充分準備，而蘇聯則處心積慮已有幾世代之久了。

自我上次來訪問索斐亞（*Sofia*）距今已六年有餘，這次舊地重臨，不禁使我回憶起昔日來。在一九二一年戰時的春天，德國與英國乃是戰爭中僅有的兩大實力，他們擇定巴爾幹為主要戰場。英人決定使希臘成為決戰場合，而德人則與保王密議，准許德軍假道該國闖入希臘，以爭迎擊在那危險的階段，若干駐留希臘的美籍人士公開地同情英人，企圖用各種可能方法來阻止這項密議的成功。但他們失敗了，德人以軍隊作為爭執的後盾，而美國那時甚至尚未宣戰。

今日在保國進行一切密謀的是蘇聯。若干在此地的美國人想阻止蘇聯的行動也已失敗——失敗的原因大部份和六年前相同。俄人正以軍隊為爭執的後盾，而且那些統治保國的人又都傾向於他們。

這局牌戲現在看來，確像一切有利的牌都在他們的手裡——大部份原因是三年以前，這局牌戲便已定規了。保加利亞是在一九四四

年九月，恰值巴黎解放後不久，成了首先請和的敵國的。這以後發生了什麼，當時守着秘密，而且始終不曾詳細發表。

那所發生的事，乃是索斐亞的親德政府最後終於失去人民的信任，而被一個親近盟國的集團所取代，很快地派遣談判者到埃及的開羅去，向英美代表提出無條件投降。蘇聯最初並沒有參加談判，因為蘇聯並未與保國開戰。索斐亞代表團請求美國的代表們立即接受他們的投降，但我們為了要答應蘇聯政府，却將這事展緩下來。在我們一方面，不過是表明一種友好態度，因為正式講來，保國的投降本與蘇聯無關。我們的代表祇想避免給俄人任何可能懷疑我們的行動的理由。這正是羅斯福總統因堅信蘇聯在他的戰後世界的偉大計劃中將真誠合作而打聽着一切的時候。

然而事情發展的结果，我們算是白白地獻了一番慫恿。俄人對我們溫和態度的答覆，是突然的向保國宣戰，而不到一星期，他們又和對方休戰了。這五日戰爭，大概是戰爭紀錄中最短的一次，而當然也是最獲利的一次。它使蘇聯軍隊不費一鎊一彈地佔領了保加利亞，同時又擋住了英美軍隊的進入。它將和談的地點自開羅移轉至莫斯科，而受蘇聯當軸的標幟，這莫斯科休戰條約於是祇限定蘇聯最高統帥部所派遣的隊伍為唯一的佔領軍。其他的條約都是不可能的，因為紅軍業已侵入保加利亞。

這事當時在各盟邦的社會間並不公開，理由是它可能給德國敵人以助力其快慰。俄人乃是我們的盟友，而且明顯地，蘇聯如奪得這戰事上的前哨，將開放一個大舞臺，把軍隊源源輸入德軍佔領的匈牙利共六地，以加速德國的潰敗。

紅軍進入保加利亞的迅速，顯然是經過仔細準備的，而且蘇聯在政治方面的準備，證明同樣也曾經過深謀遠慮。兩個曾居留蘇聯多年的保國共產黨領袖——安東·尤夫夫（Anton Yugov）與左拉·德拉古埃契夫（Zola Dragichew）一個熱狂的女性黨員，其紅軍先頭部隊同時抵達索斐亞，他們即刻便着手了一個恐怖政策。

恐怖開始的那一天——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現已被紀念為保國的獨立日。去年七月四日的保國報紙曾將它來和我們的獨立紀念日相比。

擬。這自然是擬於不倫，因為保加利亞的變動，並非直接為了反對外國的虐政，而祇是一次階級鬥爭的開始。如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革命後的情形一樣。這次肅清，據估計約有兩萬名保人是失蹤了，保國共產黨員得意揚揚地宣佈，他們已自親德份子手中奪得國家解放了。

今日凡與德人有過交往的保人都已被消滅淨盡。甚至已被放逐，兩千哩遠從前的僑寓也已廢棄，包括三位從前的攝政，共二十一位從前的文臣。

但這始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的肅清，也包含着許多曾與英美「合作」的人，即使當三大國共同聯盟對德作戰的初期，保國共產黨員仍在反復地喊着列寧的口號，「凡不與我們在一起的，便是我們的反對者。」他們不僅向親德份子公開宣戰，並對那此有不信共產主義聲名的反納粹者也公開宣戰。他們特別仇視那親近盟邦的農民黨，這溫和的政黨是最受保國農民尊重的，而且它乃是由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所構成。

我在這裏與狄米特魯夫總理會談時，他一開始便對美國外交家休戰後我們的第二個駐保政治代表梅納巴恩氏 (Maynard Barnes) 大肆抨擊。狄米特魯夫訴苦道：「自從他來到我國以後，便一直對保加利亞政府取着不友好態度，並做了我們國內反動派的顧問，在我們國人眼中看來，他已使美國在這裏的威望大受損害。」

喬治·狄米特魯夫所以不喜歡梅納巴恩氏，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為巴恩氏身兼數地力圖支持保加利亞人組織政黨以對抗共產黨人所建立的「祖國陣線」。在未到索斐亞之前，巴恩氏曾非常秘密地搜閱過德黨黨典。此雅爾達協定——均經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三氏共同簽署——它上面明白規定非共產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在任何國家的政治改組中都有同等機會。這些協定非但適用於解放國，也適用於戰敗國。而且莫斯科的休戰條約中規定在索斐亞設置一個盟國管制委員會，主席雖是蘇聯人，但英美兩國代表也都是會員。這委員會不僅在於實施休戰條約，同時為履行三大國協議的各項規定，對於歐洲所有各民族，也可予以援助，俾使他們能獲得他們所愛好的形式的政府。

巴恩氏便根據了這一點，當共產黨員在這裏開始他們反對親盟

那的農民黨的劇烈運動，並大事逮捕與壓制反對者的新聞紙及揭發所謂「陰謀」，以至幾千株連保團全部自由人士時，遂提出了有力的抗議。

我與梅納·巴恩相識已有多年，當一九四〇年德軍佔領巴黎的最初三個月中，他身負着巴黎美國大使館的事務，那時候或是不多每天都和他見面。我因此有機會觀察他在一個敵對者環伺的氛圍中工作的方法。以後當他被任為駐保公使，在赴倫敦或巴黎與我們政府中人員磋商時，我仍時常有機會和他會晤，而且好幾次他曾和我談及在保加利亞的種種經驗。

這從我們埃俄華州 (Caucasus) 出來的率直的美國人對於「反動者」並不一味地痛愛，但他在索斐亞確以暗中警戒的方式和共產黨人奮鬥着，阻止他們向農民黨領袖們攪作威福。狄米特魯夫的見解是對的，當他告訴我美國的威望在今日保國官方已大為降低，但這並非是我們的使節的過失，而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全欲盡力履行那農民黨領袖們所依賴的三大國誓約。那此敢於反對「祖國陣線」的保加利亞人因深信美國的援助已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成千的農民黨黨員已被槍殺、監禁或拘入所謂「勞動營」，而且實際上他們的政黨也已不復存在。

在保加利亞從事於政治生涯向來是一項冒險的事業，那些結果不幸失敗的人們時常受到多年的監禁或甚至性命都難保全。這無疑地便是今日索斐亞的勝利者們何以是一個神經過敏的團體的原因，他們不能忘記在極短的期間已樹立了許多死敵。現時以政府的領袖們出外總是乘有慢幕的汽車，而那慢幕之永遠是放下的。

他們的神經過敏，從去年七月四日美國駐保國代表團團長華德·勞勃遜少將 (Major Gen. Walter M. Robertson) 為慶祝美國紀念日而舉行的招待會一事看來，便可證明了。在那些貴賓中有狄米特魯夫總理，其他的內閣官員們。當這般官員到達十分鐘後，電燈忽出了毛病，使招待室變成了一片黑暗。電燈幾分鐘便修好了，但當光明重現以後，却發現保團的頭要們已逃離去。武裝衛士已簇擁着狄米特魯夫與他的同志們穿過黑暗的走廊而跳入等候在那裏的汽車。這共產主義的獨裁者，儘管證實他個人是如何的勇敢，也絕不敢隨便冒險，因為此地是

巴爾幹——在這裏電燈突然熄滅，很可能便是暗殺的信號。

美國人如梅納巴恩氏與勞勃遜將軍竭力想勸導這些內心不安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員，也給他們的政敵們一個活動的機會，這些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試望回看，現時已證明保國共產黨員曾決定在這種戰後第一次大選，他們並曾獲得蘇聯的保證，如為達到這目的而採用任何必要的方法時，得予以後援。那最大的障礙是農民黨，因為它在農民間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雖然保國的農戶生活比較若干東歐國家更勝一等，但就美國人眼中看來，他們却仍在原始的情形下工作着。他們用着樹枝做成的木耙，刈取收穫時也祇用小鐮刀，甚至連一把大型鐮刀都沒有。我曾乘汽車在富饒的農村間視察了一天，竟沒有見到一架大的農業機械。正與吾國的農民一樣，保國農民對於共產學說也都是懷疑的。他們住在鄉村間，每個人都熱愛着自己所有的小塊土地。這種人田地的保有乃是過去和腐敗專制的中央政府作激烈持久的政治鬥爭所得的結果。農夫們也贏得了高度的地方自治，這些利益使他們多半歸功於農民黨的努力。這些人祇要仍容許他們追隨昔日的領袖，共產主義必難獲得成就。

所以為國確實得到大選中的壓倒優勢，共產黨員不得不立即傾覆農民黨。他們於是運用了各種世所週知的政治詭計。他們掌握了差不多全部的金錢，管制了差不多所有的新聞紙與廣播台，在每一處鄉村間又都安插了若干機智與殘酷的組織者。他們答應不徵收保國的農戶，他們答應給村民們比前此更多的地方自治權。他們說服了少數農民黨領袖——這些人覺得和無可避免的勢力相鬥爭，已屬徒然——來加入「祖國陣線」。這一來遂分散了農民黨表決的力量，但即使如此，當選舉日——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接近時，共產仍現出了慌張的形跡，開始大批搜捕農民黨領袖。

在這些情形之下，令人驚愕的是農民黨在國民大會中竟選出了一百零一名代表，而三個非共產主義者已加入「祖國陣線」的政黨，却祇獲得六十五席。共產黨員得到了其餘的全數——總數四百六十五席中的二百九十九席。反對派的農民黨勇敢地鬥爭的結果——經美國人的鼓勵——祇成就了一件事，它使蘇聯政府在保國的地位延滯了一年。



纔穩定起來。

不管「祖國陣線」為掌握政治曾用過怎樣的暴行與詭計，但迄今日已無疑地建起了穩固的政權。一個老實的共黨政客在索斐亞曾告訴一個美國人，共黨對於這次「聯盟」中份子的過於龐雜，已感到相當的不安。他說，照共黨的「計劃」，必須在「祖國陣線」中多選舉其他黨派的非共產份子，俾使國民大會顯得更能代表民意，然而鄉村間的地方共產黨員，過於熱心，行動竟超過了他們自己的本位。

無論如何，反對者已被無情地壓制了。共產黨人的確都是很有能力的組織者，他們的兩年計劃，已激起無限量的活動，而保加利亞人目前工作得都非常繁重，即使如此，尚有成千累萬的人們是像囚犯一樣地工作着。某一個星期日，我到鄉間去旅行，看到每一家村落其新的公路上，那些「志願者」都在勞作，他們似乎愉快地工作着。當有些人在自動勞役時，工廠的卡車正載着另外一些人到山中去野餐。共產黨人想出這種邪遊的方法來使城市裏的工人快悅，很像泰曼奈(Tammany)時代的政治家們的作風，且其效果也大致相同。

事實上，共產黨人有着很多有效的政治詭計，其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不少保國人民相信，假使蘇聯人推動得稍微緩慢一些，他們仍將控制保國而免去許多的暴行。然則蘇聯其附從者為什麼要反對西方意見，並捨棄保國自由人士的同情，公開向深孚眾望的農民黨宣戰呢？

原來蘇聯政府覺得時間絕不容許它用溫和的政策來贏得保國的人民心，因為在組織整個巴爾幹區域的計劃中，必須使保國立即準備從事所指定的任務。這項計劃包括那些難於達到的企圖，如波斯拉文民族運動，開發多瑙河流域資源的多腦同盟，巴爾幹軍事與商業集團及國際共產運動的一切複雜的政治改造。

說來也許有些令人詫異，今日在保國不常聽到人們提起「共產主義」這名詞，這也是蘇聯全盤計劃之一。當我問那自青年時代起便是虔誠的共產黨員並曾監禁過多年的狄米特羅夫，他現時的政策是否係共產黨的政策，他冷靜地答覆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也不是保加利亞的總理。我的政策乃是一個保加利亞的政策。我的地位正與約瑟夫史太林

的相同，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也是蘇聯的總理。為要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史太林所行的政策正是以蘇聯的利益為依歸。

強調民族主義的地位，是今日世界各國共產宣傳的特徵。狄米特魯夫小心翼翼地宣揚他的保加利亞民族主義，不僅出諸言詞，並且也見諸行事。譬如最近他曾與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蘇聯代理主席布羅索夫將軍（Col. Gen. Buzov）有過一回爭執。據此間傳說，布羅索夫將軍在某次會議中突然攪擾了會場秩序，於是他立即予以攻擊，威怒地喊道：「你難道忘了我的地位比單一個俄國將軍更高嗎？」這究竟是怎樣一樁事且不去管它，但是經過一番調查後，布羅索夫將軍終於被召回了。

狄米特魯夫對於保加利亞「主權」的堅執，已贏得保國民族主義者的讚美。他對於英美兩國抗議文書的輕蔑答覆，甚至使他的威望在這裏的許多非共產主義者中間也大大地增加了起來。特別是因為他的強硬作風除收到對方更多無用的文牒外，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他的僚屬愉快地宣稱，狄米特魯夫已有效地抵制了一切勢力，甚至連蘇聯也包括在內。

但就事實而言，狄米特魯夫實是蘇聯在保加利亞最大的資產，一個造就的適當人才。一九三四年德國發生國會火災（註）在審判中他曾勇敢地向戈林挑戰而變成一個世界英雄，並證明他的才能確比納粹首領高強。自那事發生以來已有十三年。當時我正任在莫斯科，狄米特魯夫從柏林奏凱而歸，莫斯科紅場為歡迎他特地舉行了一次狂歡的示威運動。從此以後，狄米特魯夫便被視為外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在公共聚會的場合中，他總是很接近地和史太林站在一起。

狄米特魯夫現在已是一個老人了，但他那瘦深的眸子仍顯露着充沛的精力。他的才能與對共產主義的忠忱將他造就為一個理想的蘇聯封疆大吏。他與史太林及蘇聯政治局的其他人員們合作了那樣長久，使他本能地會迎合他們的方針，即使他以保加利亞人的立場說話的時候。他現時雖住在索斐亞前王的宮庭中，但生活却很煩瑣，因為在蘇聯的十年，他始終和蘇聯的最高官員享受着同等的特殊待遇。他平時總是在皇家狩獵場中消磨稀有的假日，那地方距離他的官邸約需



兩小時行程。

狄米特魯夫今日仍像從前任職共產國際主席時一樣地非常注意於國際局勢，大部份的內政，他都委諸僚屬手中。這些僚屬包括若干具有特殊能力的組織者。我曾與兩個被稱為和他最為親近的共產黨員談過話，一個是財政部長伊凡·史諦凡諾夫（Ivan Stifanoff），另一個是他的秘書彼得·葛里戈雷夫（Peter Grigoroff）。這兩個人給我的印象都是毫無疑問的幹才。史諦凡諾夫過去是一位教授對國外情形有着淵博的閱歷。葛里戈雷夫告訴我，他在美國曾做過九年的共產黨新聞訪員。

有這般在雷瀝着內政，並得蘇聯的後援，狄米特魯夫已使戰敗國的保加利亞，現時一切舉措有如戰勝國一般。保國對於南斯拉夫的賠償業已取消了，對於希臘的賠償也已無定期地展延下來。而且狄米特魯夫最近甚至向希臘作領土要求——雖然保加利亞曾是德國的盟邦，而希臘則是對德作戰的。狄米特魯夫公開地聲稱要收復第一次大戰時割讓給希臘的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這些地方如在保國管轄之下，將使土屬達旦尼爾（Turkish Bosphorus）被包圍無疑。

狄米特魯夫最近的這項要求，正顯示蘇聯在改組巴爾幹的計劃中所指定保國擔當的重要任務。當我向狄米特魯夫保國是否有意參加任何新的集團，他斷然地回答道：「我們並沒有這種意向。正像和斯拉夫國家建立的親密關係一樣，保國也想和所有非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國家以及西歐各大國修睦邦交。」

這項回答最引人注意的是所謂「民主」一詞。狄米特魯夫認為在戰時的政府管治之下的土耳其與希臘，並非符合他的定義的「民主國家」。而南斯拉夫與蘇聯獲其他的定義相合。保國的報紙天天在宣傳希臘與土耳其是「反動者」統治着，同時又頌揚蘇聯是「抵制反動威脅的保衛者」，而且更斷言反動者在受着美國外交政策的駕馭。

雖然保國因「主權歸還」再三地向蘇聯申謝，但實際情形是——五日戰爭的三年以後——蘇聯的軍隊仍能駐屯保國。去年八月蘇聯和保國簽定的和約並沒有肯定指明紅軍將完全撤退。蘇聯軍隊仍可留駐保國，視需要而定數量的多寡，以保衛通達奧地利的交通線。對奧

和約現在甚至尚未正式談及。

俄人其保人在這裡的關係是很奇妙的，因為俄人其當地人民很少雜居混家。蘇聯的勢力是由最上層直接傳達的，大多數的保國人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與俄人沒有聯繫。紅軍士兵們平常總是被限制於他們駐屯的區域中，在極少的外出機會中，他們的行動也很合乎規矩。一位美國軍人曾向我說，「我很懷疑在我們的佔領軍中是否能夠多年遵守著嚴格的紀律，像蘇聯軍隊在這裏所屬行的一樣。」

一年以前，蘇聯確實準備撤退大部佔領保國的軍隊，蘇聯軍事長官曾告訴保國的合作者，他們希望不久以後，祇留二萬五千名紅軍士兵在這裡，以維持抵禦西方的陣線。但當杜魯門總統安撫于土耳其與希臘以援助後，蘇聯的復員立刻停止，而為數約近十萬的兵士便一直留在這裏，直等到去年八月蘇聯政府批准和約時為止。

同時共產黨反對派的運動也益發劇烈了起來。說來慚愧，美國對於反抗共產政權的保加利亞人實在是毫無助力，這且看秋米特魯夫（Metko Pichko）坐以謀叛之罪，並處以死刑一事便可證明了。彼特高夫在戰前久已是一個勇敢的反對派者，當納粹肆虐的時期，曾不斷地帶着被捕或被殺的危險。他的主要「罪狀」是一九四五年進入了那曾由他幫助組織起來的「祖國陣線」在美國的總總下轉入了反對派一方面去。美國政府對於彼特高夫受審與定讞的無用的抗議，僅：証實了秋米特魯夫的警告，反對派的領袖們絕不能從美國獲得任何有效的支援。

一方面蘇聯的勢力已在這裏明顯地建立了起來，另一方面則美國正推動着毗鄰的希臘與土耳其，保加利亞人民深：地覺得這個國家將仍是一次兩大勢力的爆烈鬥爭中的犧牲品。在農村間，去年美國人常被殷切地詢問，為什麼蘇聯軍隊仍留在這裏，為什麼保國的青年要被召募從軍。他們憂傷地問道，「我們這裏難道非再做一次外國戰爭的戰場不可嗎？」

去年七月索斐亞的美國領事館曾宣佈可以受理保國人民移往美國的申請，從這一事便可看出他們對於另一次戰爭所懷的恐懼了。我們的領事館並未希望能夠得到任何由衷的回應。因為第一「祖國陣線

的報紙曾警告保國人民凡登記的都將被視為「逃亡者」，第二，保國人民對於美國今日所得到的惟一印象，正與受納粹管制的時代的相同，是一幅極惡劣的畫面。

我曾檢視這些報章，而對於它上面的漫畫特別感到興趣。有一幅畫着一個肥胖的美國商人站在一堆馬鈴薯與一大堆鎗彈中間，說：「將馬鈴薯丟入海中以提高價錢，送鎗彈給歐洲，讓它的人民挨餓。」另有一張漫畫描繪着山姆叔正拿一瓶飲料餵一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小孩，瓶上面注有「反動」兩字。那標題是：「山姆叔的另一寵兒。」還有一幅畫着一個號是滿汗的人正拖着一部兩輪車，車中坐着山姆叔，要弄一塊銀元來誘或這緊張的拖車者。標題「馬道」，美國想靠榨取匱乏的歐洲來免除經濟危機。

在這樣的宣傳中，我們的領事館確沒有想到他的告示會獲得很多的回答。這告示祇是一方很小的報章廣告，而且又指明每年祇能允准一百名申請者。這項名額的限定，乃是根據保國人民從未大量僑居他國的事實。在美國全境，祖籍保加利亞的公民今日僅有一萬五千名。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我們的領事館估計開始時申請者最多也不會超過五百名。

但當開始登記的前夕，從八點鐘起，申請者便形成了一字長蛇陣，沒有多久竟擴充得連交通都阻斷了。共產黨的攝影記者趕來拍攝那些申請者的照片，大聲吆喝着說，將把這些照片在報紙上公開出來。一個美國官員用保國語言向羣演說，勸人民回家，假使願意的話可以明早再來。那些等候着的人民很有禮貌地拍三響掌——然而他們卻沒有離去行列。

在以後幾天中，又發現了一萬七千多申請者。我們領事館中每一個員工都不得不出來為維持羣眾秩序而服務。一個鄰近希臘邊境的鄉村派了三個代表來，宣稱有三十五戶人家委託他們前來辦理申請登記。美國副領事問他們：「你們的鄉村有多大？」回答是：「我們的鄉村共有三十五戶人家。」

這些想放棄鄉土的保國人民，大部份都是愛好和平者，他們對於居住在一个沒有和平之望的區域裡已感到十分厭倦。狄米特魯夫，這敏

鏡的政治家，當我向他保國是否像蘇聯一樣地將實行「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時，大概也想到了這種渴望和平的普遍現象。

他憤然地道：「我曾再三聲明保加利亞可以達到社會主義化的階段，而不必求之於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他接着又含糊地道：「但這將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保加利亞共和國的態度而定。」

他企圖使人獲得一種印象，好像保國的威脅是從西方來的，而不是從蘇聯來的。他不管保國在他領導之下，已被蘇聯利用為施壓力於希臘土耳其的據點，以及經三年來有組織的準備，保國已成為蘇聯在這歐洲傳統的火藥庫——巴爾幹——的主要軍事基地了。

——完——

〔註〕

德國國會火災 Reichstag Fire 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時值納粹黨權後不久。此舉目的在於造成藉口，以壓倒共產黨暨其他反對黨。倫敦曾為此事作詳密調查，發表報告謂指揮放火者係德國會議長戈林氏。